

第七章 結 論

明年（2005 年）即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 60 週年，也是「大日本帝國」殖民體制終結的 60 週年。在這將近一甲子的歲月中，東亞地區不斷地上演「痛斥殖民統治 v.s. 歌頌殖民統治」的論爭。滿洲國作為日本殖民主義時代的一個鮮明標記，是身為華人的我們所不能忽視的，問題在於我們如何去重新認識它。筆者以為，歷史研究不僅僅是為了「塑造國族」，更是為了有助於今人認識現代世界的成因、明瞭自身在時間長河中的座標。如果我們採取這樣的觀點來回顧這一段殖民法制史，或許能夠在政治語言充斥的當代，提出較為客觀的評價。以下是筆者研究日本殖民統治與滿洲國法制之關係後，所得到的些許心得。

其一、日本式殖民觀的中華思想

日本認為，對外殖民，乃是「脫亞入歐」運動的一環。透過殖民地的取得與統治，日本欲證明自身的「近代化程度」已與西方國家等量齊觀。然而，日本人對於「殖民統治」的觀念，卻與西方（尤其是英國）有不少差異。很諷刺地，日本人殖民觀的核心理念，並非取自歐美列強，反而是承襲自中國的「天下觀」。亦即，中國有很長的一段時間，一直扮演東亞世界的霸主。中華帝國認為自己有一種使命，必須「教化四鄰」，而針對帝國領域內的各族人民，更是致力於「用夏變夷」，甚至入主中原的異族征服者也多是「入中國則中國之」。有學者分析認為，日本在亞洲的擴張，根本就是中國歷次異族「入主中原」、「爭天下」的翻版，差別只在於，元、清成功「一統天下」，而日本則終歸失敗¹。日本在這種「中華思想」的影響下，對殖民地的態度，也是以「同化」為目標，使日本內地的秩序擴張或複製於殖民地。與此相反，西方殖民國家中，英國並不打算將被殖民者完全同化，「他們和英國人不同，英國人深信孟加拉人（Bengalis）和約魯

¹ 參閱張啟雄，〈百年來東亞政治格局的變遷〉，載於《歷史月刊》第 189 期（台北：歷史月刊雜誌社，2003 年 10 月）。

巴人（Yoruba）基本上不是英國人，也永遠不會是英國人」²。當然，同樣身為西方殖民強權，法國代表著另一種典型，他們堅持同化主義，「相信應將其屬地居民轉化為法國人，轉化為概念上的『我們高盧祖先』的後裔」³，這乃是基於「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」的「普世價值」，與日本的同化理念仍有差異。

在「中華思想」同化理念指導下的日本殖民政策，不但可見於對台灣及朝鮮的統治，亦可見於滿洲國的建構。由本論文的探討可知，滿洲國的法制幾乎均由日本人主導設計。在國家體制上，初期雖模仿中華民國，作為國民政府的「對抗型」；然而，到了1934年即改行帝制，以仿效日本的天皇制度。在行政架構方面，亦銳意移植日本制度。在1932年至1937年間，民、刑法及訴訟法等主要司法法規，由於在制定上較為困難，故仍「援用」中華民國法，然而滿洲國該等法規的起草工作則已然在進行中。時至1937年，配合「治外法權撤廢」，滿洲國自己的主要司法法規終於施行。在這些新定司法法規中，我們可以嗅到濃厚的日本味兒；然而，更精確地說，這些法制乃是「改造過的日本法」。它們很多是在實現日本學界、實務界的理想或最新的法學思潮；與此一體兩面，這些新法（尤其是刑事法）亦有不少繼承了當時盛極一時的「全體主義」法哲學，用以鞏固專制政權，對人權造成了相當程度的侵害。

日本部分法學家甚至提出一種說法，即希望東亞在日本主導下，形成一「東亞法律圈」（東亞法律 bloc）。這不僅是中華傳統「天下」觀念的延伸，甚至可認為是「區域統合」思想的先驅。當然，不可否認的是，這種提倡東亞法律「同化」或「統合」的論述，一方面是作為日本向外擴張的理論基礎，另一方面也是以日本的國勢作為後盾。

其二、建立「現代國家」的實驗

中華民國法體制，在形式上已是「現代西方式」的；然而在實際上，二次大戰前的中國，在統治形態上仍殘留傳統中華帝國的模式，相當欠缺

² Eric J. Hobsbawn 著，賈士蘅譯，《帝國的年代：1875-1914》（*The Age of Empire 1875-1914*）（台北：麥田，1997年），頁101。

³ Eric J. Hobsbawn 著，賈士蘅譯，《帝國的年代：1875-1914》，頁101。

「現代性」(modernity)⁴。滿洲作為中國之一部分，其情形亦如是。日本人扶植滿洲國之後，為貫徹日本國家意志、擴張殖民利益，銳意將滿洲國建立成一「現代國家」(modern state)。這裡所謂「現代國家」，乃是以國家對人民、領土的支配能力來定義，現代國家有一套完備的官僚行政體系，並且能夠壟斷暴力（如：軍事權、刑罰權、強制執行權）之行使⁵。亦即，日本人希望使滿洲國的官方權力能直接達到每一個「國民」及全國各地，進而有效率地大規模動員當地一切的人力、物力、財力，為日本帝國的發展服務。

為了達到建立「現代國家」的目標，日滿當局巧妙地以漸進的立法手段拔除地方既存的統治勢力，與明治維新時期的「廢藩置縣」一樣，都是在掃除封建勢力而使中央權力能深入地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滿洲國的政府組織及行政區劃，為了配合時勢需要，在 14 年間作了多次變化，這一方面除了反映世局變化的快速，也顯示日本統治者對行政組織的彈性處理。在滿洲國治安大體整頓之後，傳統中華色彩的「保甲制度」終於改變為近代式的「街村制」，而日滿當局期待後者擔負起警察行政、教育行政、人力及物質動員的整合工作，用紀登斯（Anthony Giddens）的話來說，就是行政力量「日益進入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」⁶。這種改變，象徵著滿洲國的基層地方行政任務，已由消極的「保境安民」演進為積極的「統合動員」，符合「現代國家」的基本概念。

此外，為了使國家權力能夠確實直達「個別國民」，滿洲國訂定了《民籍法》及「指紋登錄」制度來建立普遍性的個人資料。不過，諷刺的是，滿洲國自始至終均未制定「國籍法」，以致「國民」的範圍一直模糊不清，無法加以明確地界定。維持「國籍」概念的不確定，固然有便利日本人之考量存在，然而究非長久之計，是故官方及學者提出了各種「國籍法」的草案，惟因滿洲國之「早逝」而終未立法。不過，我們若由當時日滿官方的最高指導原則「日滿一體化」、「日滿不可分」來考察，維持滿洲人民國籍的曖昧性，或許才是最有助於日本進一步統合滿洲的策略。

⁴ 在戰前日本的觀點中，中國之所以不是「現代化國家」，乃由於中國雖有政府，但政府與國民是分離的，無法達到「國家政策與國民一體」或「國民總動員」的目標。參閱葉紘麟，形塑「現代化國家」的可能：滿洲國的國民動員與民族形塑，載於《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》第 59 期（台北：台大政治系，2003 年 11 月），頁 20-22。

⁵ 參閱阿部齊等編，《現代政治學小辭典》（東京：有斐閣，1999 年），頁 92。

⁶ Anthony Giddens 著，胡宗澤、趙力濤譯，《民族 - 國家與暴力》（*The Nation-State and Violence*）（台北：左岸，2002 年），頁 317。

除了在行政體系的大幅改革外，日本人為了使滿洲國更具「現代國家」的體面、並創造可信賴的紛爭解決機制，因而在滿洲國大力推動司法體系的建設。這種建設可分為制度的、人員的及設備的三方面。在制度上，滿洲國的新《法院組織法》實為改革後的日本法制，惟對法官的身分保障稍遜於日本，使審判的獨立性較受行政權之威脅。在人員方面，日本人材的引進及在地人材的培育雙管齊下，使滿洲國司法人員的素質短期內大幅提升。根據梁肅戎先生的回憶，滿洲國司法官的操守一般都相當好，故在社會上的評價頗高⁷。而在設備的建設上，由於當局投入大量經費，並且司法人員日漸充足，以致正規法院得以普遍設立，而大幅取代了「行政兼理司法」之變則司法機關。

其三、揉合各家思想的立法政策

日本在維新的過程中，幾乎是全面性地（身分法除外）繼受西方近代法制（在其他方面也是抱持著同樣的態度進行西化）。然而，這種「全盤西化」的傾向，到了大正、昭和時代面臨挑戰，許多日本人開始反省西化帶來的問題。軍國主義興起後，日本官方意識形態更是加強了「對抗西方」的成分。滿洲國的立法工作，恰逢這種「文明衝突」(conflict of civilizations) 的歷史階段，是故其基調亦揉合東方固有文化的色彩。該現象在滿洲國的《親屬身分法要綱》中最为顯著，其中諸多設計在於保存華人社會的慣習。因之，若由近代西方法制的觀點來看，滿洲國《親屬身分法要綱》整體而言，要比中華民國《民法》親屬、繼承編來得「落後」許多。

其次，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，在共黨「第三國際」的指導下，共產主義思想及革命行動擴散至世界各地。日本當時的社會本有諸多矛盾，適為共產思想生根發芽的溫床，許多知識分子傾心於馬列學說。滿洲國成立之後，許多在日本國內受迫害（例如：1934 年京都帝大的瀧川事件⁸）

⁷ 2003 年 6 月 11 日上午，於台北市和平國際法律事務所，筆者對梁肅戎先生之訪談，參閱本文附錄二。

⁸ 1934 年 4 月，法學者瀧川政次郎，在《經濟往來》雜誌發表「大化改新管見」，內容觸犯了日本官方的忌諱，瀧川因而被解除中央大學的教職。中央大學校長原嘉道及該校法學部長林賴三郎，很同情瀧川，於是推薦他到滿洲國司法部法學校任教授。參閱島善高，「中國における瀧川政次郎先生」，載於《古代文化》第 51 卷第 2 號（京都：古代文化研究會，1999 年 2 月），頁 56。

或不得志的左派知識分子，陸續前往滿洲「新天地」發展。主導滿洲國立法政策的階層，有的為了安撫左翼勢力，有的為了實踐自身信念，在滿洲國的民、商及經濟法制中，注入了社會主義或反資本主義的要素。

基本上，日本在滿洲的經營，乃是一種人力、資金、資源的大規模、總體動員。這種動員分為兩個面向，一為動員日本國內之人力、資金、資源，二為動員滿洲當地的人力、資金、資源。在這兩方面，日本統治者均須解決三個課題，一是「整編」已在手中的資源，二是「收編」尚未到手者，三是「運用」資源以產生更大的利益。法律在此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，至為關鍵：一方面，它必須作為各種強制力（或者曰「國家暴力」）的「合法性外衣」，二方面，它必須能夠塑造一個吸引人的外觀，以「收編」各種人力、物力（尤其是人力）。前者之內涵，在建立一有利於殖民統治的秩序；後者之內涵，則係以法律的形式，將原本與殖民統治相拮抗的理念，作某種程度的「吸納」，以達到攏絡人心的效果，並作為各方勢力的妥協。滿洲國的立法，企圖以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內容，滿足左翼人士（他們是日本內部反帝國主義的主力）的理想；另一方面，又以「擬裝」的「現代性」及「五族協和」來吸引華人的改革派；此外，「撤廢領事裁判權」運動，則在迎合當地民族主義者的心理（雖然效果值得懷疑）。

如本文之前所述，滿洲國的經濟法制在關東軍的主導下，帶有強烈「反財閥」、「反自由經濟」、「計畫經濟」、「國家經營」等色彩；然而，其是否就等同「社會主義」法制？法學家 Gustav Radbruch，曾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意志帝國的「戰時社會主義」（Kriegssozialismus），與真正的「社會主義」作出分辨⁹：

戰時經濟形態表現出組織化的經濟結構，以及全面性的經濟法。在當時稱為「戰爭社會主義」，但如果把所謂的戰爭社會主義理解為社會主義的前身，則是完全錯誤的，戰爭社會主義是指國家將整體經濟生活納入國家本身，而社會主義觀點則認為國家應奠基於未來的總體經濟上，發展為新的共同體。整個國內經濟為國家的權力目的而服務，這種觀念比較符合專制國家的重商主義（Merkantilismus）經濟論，而非社會主義的綱領。這意味著那需要有彈性的法律形成的經濟，將被迫陷於官僚主義下僵化的國家行政窠臼中……

⁹ Gustav Radbruch 著，王怡蘋、林宏濤譯，《法學導論》（*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wissenschaft*）（台北：商周，2000年），頁121。

觀乎滿洲國的經濟法制，雖包含有少壯軍人對日本資本主義的反動，然而正如石原莞爾的看法，滿洲國應作為日本在未來大模戰爭中的重要基地，是故其經濟法制不免帶有濃厚的「戰爭社會主義」色彩，是為帝國征戰而服務的。到了滿洲國後期，像「特殊會社」、「國策會社」的營運問題愈形明顯，竟印證了上述 Radbruch 見解。

總而言之，由於領導階層之「人的因素」，我們所見的滿洲國法制，並不像典型的「殖民地法制」。Louise Young 指出¹⁰：

本時期帝國主義的刻板印象(stereotype)，傾向以熊彼得(Schumpeter)的用辭來想像殖民地：退化的省份、倒行逆施的獨裁者及惡霸。事實上，日本的殖民設計者，包含了進步的知識分子，他們站在當時最具前瞻性的社會及文化運動之前鋒。

在這種情形下，滿洲國法制就整體而言，固然是為了日本的國家利益服務；然而，為了維持「獨立國」的體面以及迎合各種思想路線相異的群體，滿洲國法制顯現出若干的理想性與進步性，雖然由於種種因素而不見得完全落實，其仍為法制史及殖民統治史上極特殊的一頁。此一史實也說明，將所謂「殖民統治者」視為一個「整體」，是過度簡化的想法，往往會使研究者不自覺地陷於「全面攻訐」或「全面歌頌」之謬誤，妨礙了對殖民史真相的探究。

其四、殖民經驗的傳承

在滿洲國於 1932 年成立之時，日本已領有台灣 37 年、關東州租借地 27 年、朝鮮 22 年、太平洋委任統治地（「南洋廳」）13 年。台灣、關東州原為中華帝國之一部，朝鮮則為「華化」甚深的中國藩屬。由此可知，日本殖民地的絕大部分是位在「中華文化圈」之內。其統治方式實有若干程度的共通性，因而也有相互傳承的現象存在。

滿洲國作為另一個取自中國的殖民地，其統治政策在很多方面皆借鑑

¹⁰ Young, Louise. *Japan's Total Empire: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* (Los Angeles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98), pp. 242.

「台灣經驗」、「朝鮮經驗」或「關東州經驗」。此點在刑事立法政策方面尤為顯著。例如，傳統中國法的「保甲制度」，在台灣、朝鮮、關東州實行頗有成效，故亦於滿洲國前期採行。其次，滿洲作為一個「移民地區」及「邊疆地方」，其社會的「草莽性格」與台灣頗為類似，是故日本在該地亦採取了類似的刑事鎮壓政策。例如：針對匪團及抗日遊擊隊的「治安庭」（類似台灣的「臨時法院」）、取締「浮浪者」的《保安矯正法》（類似《台灣浮浪者取締規則》）。

在民事法方面，日本在台灣、關東州，相當「尊重」在地關於親屬繼承事項的慣習，而不敢輕易以立法方式加以變更。與此類似，1937年《民法》前三編（總則、物權、債權）均已施行，惟親屬、繼承法仍尚未立法。滿洲國多數的立法，並不甚重視華人的意見，惟獨在親屬繼承法的制定過程，不但延攬許多「滿系」審議委員，並且還進行了大規模的身分慣習調查。

在土地資源的掌控方面，滿洲國的土地法制及大規模地籍整理，也具有日本統治台灣及朝鮮經驗的影子。

其五、形式法治主義的實踐

日本由於經歷了明治維新大規模繼受西方法的改革，故相當重視「法治」。不過，日本在滿洲國，由於是專制的殖民統治，是故絕不可能稱得上「法律之治」（rule of law）；然而，這個殖民政權卻仍相當遵循「以法統治」（rule by law），亦即「形式上」的法治主義。在後者的方針下，統治者雖不允許人民自我決定法律的內容、不允許人民質疑法律內容的正當性，但是仍承諾統治者必須受到其自身立法的拘束。因此，滿洲國政權的一大特色就是，「法令多如牛毛」之現象，以致當地人民創出了「法匪」一詞詬罵日本人。根據黃清琦先生對中國東北居民的訪談，「一些老一輩的人私下透露滿洲國的典章制度均已上軌道，滿洲國建設與國家意識的樹立也有一定基礎」¹¹；而梁肅戎先生之友人吳國振¹²也曾向其感嘆道：「滿

¹¹ 黃清琦，〈旅大租借地之研究（1898-1945）〉（台北：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3年），頁184。

¹² 曾任滿洲國法官。戰後亦通過中華民國高等考試，來台後執律師業。

洲國是假的，法律是真的；中華民國是真的，法律是假的！」¹³此感言固然不免是一種誇張的諷刺修辭，卻仍生動地描繪出滿洲國當局重視「形式法治主義」的一面。

因此，日滿當局雖大力鎮壓反抗者，然而滿洲國司法機關在審判政治犯、思想犯時，仍稟持對法律的忠誠，並謹守「慎刑」之道，因此緩和了殖民統治的高壓性。日滿當局之所以能容認司法機關此種作風，或許可歸因於明治維新後日本人普遍對司法權的高度尊重；而由統治策略的觀點來看，確立滿洲人民對司法機關的信賴，應該也是有助於降低其對滿洲國政權的反抗意識，更可顯現該政權對於國民黨政府的「優越性」。

其六、滿洲國體制的遺緒

滿洲國於 1945 年 8 月亡於蘇聯軍隊的進攻。回歸中國的滿洲，旋即陷入國共內戰的大動亂中。滿洲國法制與中華民國法制系出同源，日本在當地的法律建設仍可能順利為國民政府所承繼。然而，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，中國的法律制度改採模仿蘇聯的「社會主義法系」，滿洲國法制「遺產」在若干方面，已無法發揮影響力。很弔詭地，滿洲國的法政體制及統治策略，竟是在境外的朝鮮半島被大規模仿效。南韓學者韓洪九指出，南北韓的重要領導人如朴正熙、金日成的「滿洲國經驗」影響了他們的治國方針¹⁴：

韓國大眾通常會將滿洲視為上古朝鮮史的舞台，然而滿洲也是孕育南北韓種子的溫床。分別領導分裂朝鮮的金日成及朴正熙，他們的青年時期均在滿洲渡過。他們的滿洲經驗，雖然本質上相反，均深刻地影響他們對國家機構及社會的經營。

金日成曾在滿洲國境內領導抗日遊擊隊，朴正熙原為日治朝鮮的學校

¹³ 2003 年 6 月 11 日上午，於台北市和平國際法律事務所，筆者對梁肅戎先生之訪談，參閱本文附錄二。

¹⁴ 韓洪九，〈大韓民國 滿洲國 遺產 英文摘要〉，載於《中國史研究》第 16 輯（大邱：中國史學會，2001 年 12 月），237 頁以下。

教員，後「投筆從戎」進入滿洲國陸軍軍官學校¹⁵。戰後南韓偏重大企業、重化工業的快速經濟發展，就是師法滿洲國的計畫經濟¹⁶：

南韓的經濟發展計畫乃是根生於滿洲國。朴正熙聚焦於出口導向政策及重化學工業、建基於軍事工業的經濟策略，大部分是承繼自滿洲國的經濟計畫，反而不是來自日本殖民政府或日本本土。

此外，1970 年代南韓的威權體制，更是大規模地模仿滿洲國當局控制、動員群眾的手法¹⁷：

滿洲國的社會氛圍中，國家規制了國民日常生活的每一面向，這在南韓復活了。星期一早晨的愛國儀式，開始於朗讀國民教育憲章、結束於健康操；星期四早晨的軍訓儀式，重複著閱軍及縱隊行進；向國旗宣誓；在學校檢查午餐便當，以規制食用稻米；透過滅鼠及滅寄生蟲運動無止境地強調公共衛生；在學校及街上強制檢查長髮；早晨的街道清掃動員了學生及公務員；反共大會動員了數萬或數十萬平民及學生；取得身分證前須按十指指紋。所有這些在 1970 年代南韓司空見慣的景象，都是滿洲國社會氛圍的複製。

不僅如此，早在 1954 年南韓起草民法典時，「民法案審議小委員會」所開列應調查檢討的「外國立法例」為德國《民法》、瑞士《民法》及《債務法》、法國《民法》、義大利《民法》、中華民國《民法》、滿洲國《民法》、日本《民法》、蘇聯《民法》¹⁸，滿洲國《民法》赫然名列其中，並且對南韓《民法》有相當的影響。反觀戰後的中國及台灣，由於官方對滿洲國定位為「偽政權」，看作歷史的污點，連帶地對滿洲國法制亦不屑一顧。

而對於殖民母國而言，滿洲國的統治經驗，也影響了戰後日本的復興。「觀乎政策及立法乃至行政機構，滿洲國秉持著對日本的實驗性、先

¹⁵ 參閱 Mark R. Peattie 著，淺野豐美譯，《殖民地 帝國 50 年の興亡》（東京：讀賣新聞社，1996 年），頁 330。

¹⁶ 韓洪九，大韓民國 滿洲國 遺產 英文摘要。

¹⁷ 韓洪九，大韓民國 滿洲國 遺產 英文摘要。

¹⁸ 鄭鍾休，《韓國民法典の比較法的研究》（東京：創文社，1989 年），頁 165。南韓《民法》與滿洲國《民法》的比較研究，參閱同書頁 199 以下及頁 301 以下。

行性而試行之例子不勝枚舉」¹⁹，「美國 Fortune 雜誌的「日本」特集號(1944年4月號)，將滿洲國政府稱為『陸軍滿洲學校文官部』，滿洲國自身扮演著實驗室、研修室的角色」²⁰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曾經參與滿洲國立法、或在滿洲國執法的日本人，於戰後回到日本國內，對於日本的法政改革，也發揮了一定程度的影響。

作為本文的總結，筆者想指出，殖民統治的本質是惡的。因為殖民統治代表了對「被殖民者」的宰制與蔑視。被殖民者在殖民體制下，往往無法決定自身的前途。殖民統治者雖然也可能會有「善政」，但本質上仍是出於利己的動機，被殖民者的福祉考量仍在其次。當然，我們也不能否認，在參與殖民統治的某些「個人」，確實是抱持者「救世」、「獻身」的態度。然而彼等的善意，一方面可能為殖民決策者所利用，另一方面，由於缺乏對殖民地深刻的理解，其善意也可能會帶來反效果。是故，所謂「善意的惡政」常可見於殖民統治史。滿洲國相較於典型的殖民地，似乎多帶有一些「理想性」，然而殖民統治的本質以及世界大戰的時代背景，使得這些理想大多淪為泡影以及美麗的宣傳詞藻。

¹⁹ 山室信一，《キメラ：滿洲國の肖像》（東京：中央公論新社，1999年），頁267-268。

²⁰ 山室信一，《キメラ：滿洲國の肖像》，頁266。